

# 文学地域性与对话艺术

## ——谈张明《泉州作家访谈录》及访谈录的文体特点

◎ 林晓嵘 郑丽霞

**摘要：**访谈录作为对话批评的一种文体，为读者了解作家提供了新的角度。张明所著《泉州作家访谈录》一书，以感性、直观的方式重点记录了与24名泉州作家的访谈过程。从其内容和文体特点进行解读，可见对话中体现了浓厚的闽味乡情，对话极具互补性、逻辑性，谈话氛围轻松闲适。

**关键词：**《泉州作家访谈录》 文学地域性 对话批评

作为新泉州人的张明，将自己的心植根于泉州，主动联系泉州的文化工作者，为泉州的文化建设搜集众多的学术资料，致力于泉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泉州作家访谈录》一书就是张明探究泉州文学史的大胆尝试。该书以感性、直观的笔墨记录了张明对颇具影响力的24名泉州作家和数十位青年作家、女性作家的访谈过程。24名泉州作家中有泉州籍的在外知名作家12人，泉州本土作家12人，这些作家身份各异，有的还是画家、书法家、建筑师，他们所擅长的创作文体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泉州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正如福建社科院副院长刘小新博士所言：“这些作家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是生于国外的华侨，有的是台湾外省第二代，有的在外省出生、工作，有的植根于故乡本土，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地域空间对泉州文化的投射和吸收，而泉州文化也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家在不同空间中焕发出光彩。”<sup>①</sup>针对不同作家的特点，张明设置一系列“个性化问题”，但是，异中有同，在访谈过程中始终将话题围绕着泉州地域文学这个核心展开，力图在与多种声音的对话中体现泉州文学的地域性。

访谈录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到孔子的《论语》再到诗话、词话，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访谈录以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对话精神”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为理论基础，逐步发展为对话体批评的变体，以交往对话的方式存在。访谈录本来是一种新闻文体，在《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是这样对其定义的：“访谈录是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进行专访报道的一种形式。它主要用于针对某一思想主题、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对有关人物进行的访问，是一种经过悉心整理的，紧紧围绕主题的谈话实录。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乃至被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可以兼用问答辩论形式，叙述见闻，发表自己的见解……”<sup>②</sup>由此可以看出，作家访谈录这种文体是针对作家及其具体作品的讨论，是文学现场的真实、原生态的反映。在扬州大学陈玉的硕士学位论文《访谈录批评文体研究》中，她指出：“访谈录作为特殊的批评文体，批评与接受可以做到共体。同时，语言兼具严谨和零散趣味。在兼顾时效性与实效性的同时，达成求同存

异、和解互补的结论。”<sup>③</sup>诚如斯言,要将语言见诸文字,必须具备一定的严谨性,但是,访谈录作为特殊的文体,在对话中难免出现零散的口语。张明在访谈过程中更多探讨的是那些具有学术前沿性的问题,这些有价值的问题在物理时间的积淀下反而会显得更加成熟,这正是访谈录时效性和实效性的体现。据笔者了解,张明在访谈前,一般会先列好提纲,围绕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历程、具体作品、艺术理念等主题展开访谈。其访谈录贴近日常生活,摒弃一般文学批评的严肃作风和固定套路,创设自由轻松的对话氛围,在轻松的批评环境下,受访者畅所欲言,为采访者答疑解惑,访谈者认真倾听,在访谈过程中进行真正的思维碰撞,点到为止,体现对话的互补性。访谈者礼貌谦让,默认受访者为主角,有着互补和解的结论,对被访作家及其作品有着审美、研究的现实意义。尤为难得的是,张明独具匠心,力求做到将访谈录文体独具的对话艺术与文学地域性相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对话中的闽味乡情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环境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也不难找到对这种文学规律的论述。在浪漫主义时期,法国的文论家斯塔尔夫人在其《论文学》《论德国》等著作中谈及地理环境及气候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而“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sup>④</sup>斯塔尔夫指出在不同的地域影响下,因为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南方和北方的文学风格差异甚大。曾大兴教授在其著作《文学地理学概论》第二章第三节中指出自然气候和人文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习俗。”<sup>⑤</sup>“就文学家的成长来讲,也是不能离开相应的人文气候,不能离开相应的风俗(风气、民俗、民风)的。”<sup>⑥</sup>笔者认为,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性格气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创作出的作品风格自然千姿百态,而且,作家创作往往取材于生活,所处的环境不同,可供作家选取的社会材料自然不同,写作题材就有了局限性。作家将生活素材进行再加工,使得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历史故事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或引起读者共鸣,唤起同处于该环境的人对自己家乡的地方感认同,这种对具体地方的向往与想念就是文学地方感构建的产物。

众所周知,泉州是一座有厚重历史感的城市,有着深厚的闽南文化积淀,泉州文学随着泉州经济社会发展重新焕发生机。张明的《泉州作家访谈录》充分关注了泉州文学的地域性。这种闽味乡情具体体现在:

(1) 关注闽南特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闽南文化不断丰富,被赋予更多内涵,泉州地区作为闽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其方言和精神内涵与闽南文化基本保持一致。林华东教授主编、陈燕玲教授编著的《闽南文化概要》一书介绍,闽南文化“包括闽南方言文化、闽

南民俗文化、闽南宗族文化、闽南文学艺术、闽南华侨文化和闽南海丝文化等方面,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sup>⑦</sup>林华东教授在论文《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本位和乡土色彩,在闽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sup>⑧</sup>闽南人重乡崇祖,有着强烈的家族意识。闽南不少地区,都会有修族谱、建祠堂的习惯,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乡土意识,会在门匾上刻下“西河衍派”“九牧传芳”等来标明自己祖先的出处。为了生存,不少闽南人在海上漂泊,许多在外多年的华侨,客死他乡,却也要落叶归根,回归故土。这应是闽南人重乡崇祖的集体无意识使然。张明关注到闽南人“崇乡重祖”的乡土情结,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强烈的乡土意识在张明与作家们的访谈中时有体现。如《文学,在我幼时就种下了根——龚书绵访谈录》一文,作者提问移居台湾长达半世纪的龚书绵:“因为历史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您才重返故乡,这就更加深了您对故乡的眷恋,故乡成为您创作的源泉。这种浓浓的乡情有没有反映在您的文学作品上?”<sup>⑨</sup>提问中,张明关注到了隐藏在闽南人心中的浓浓乡情,并捕捉到其可能对作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在《为孩子们,我应该拿起笔——庄之明访谈录》中,作者从庄之明先生的笔名“青阳”入手,关注其回到家乡后关于记述家乡发展变化的几篇文章,提出“家乡文化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sup>⑩</sup>问题。在《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庄伟杰访谈录》中,其根据作家庄伟杰的诗文集,询问“这些著作是不是可认定是您对家园刻骨铭心的体验结晶?”<sup>⑪</sup>故乡可以看成是人心灵的出发点和精神的归属地,张明结合具体文本和作家的人生经历,探讨家乡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符合闽南人“重乡崇祖”的实际。闽南文化博大精深,闽南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泉州地区的文化载体,在闽南方言中可以窥见泉州的特色文化。张明也关注到闽南方言对泉州籍作家创作的影响。在《要读一本书,请先认准“文学”这个路标——林东海访谈录》一文中,作者关注林东海先生因为与闽南语的渊源而走上了旧体诗词创作道路,探索了闽南方言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为闽南地区的作家创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启示。同时,在《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刘再复访谈录》中,张明也提出“您关注过闽南语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吗?”<sup>⑫</sup>双方共同探讨如若能将闽南语引入文本,将分寸把握好,那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且可以小见大,从闽南方言中去感悟泉州文化的独特魅力。弘一法师与泉州有着特别的缘分,张明也关注其对部分泉州籍作家产生的影响。弘一法师到泉州驻锡时亲自为开元寺写上楹联:“此地古城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弘一法师重视闽南文物的保护,在了解闽南习俗、风土人情后他编写了一系列文献资料,为后世研究闽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泉州作家访谈录》中,作者张明从弘一法师与闽南的文化渊源着手,关注作家和弘一法师的交往及其得到的启示。在《走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刘再复访谈录》中,作者提到“弘一法师最后的十几年时光都是在闽南度过的”。<sup>⑬</sup>从而点明了弘一法师与闽南文化之间的联系,弘一法师的“大慈悲”精神境界让人折服,而这也是写作者应该试图建构的心灵世界。在《文学创作是应该坚持不懈的神圣工作——孙立川访谈录》中,作者从作家孙立川对泉州海上丝路的研究出发,询问其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弘一法师的,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弘一法师对佛教的传承及闽南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弘一法师的书法、创作和精神境界给泉州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和生机。张明在作品中体现的对闽南特色文化的关注有利于读者

认识到闽南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读者体会到闽南人身上特有的强烈家族归属感和“崇乡重祖”的乡土色彩。其次,谈论闽南方言对作家写作的影响,也可能为其他泉州籍作家的创作提供新思路,即若是能很好地将闽南方言结合到作品中,定会焕发不一样的地域光彩。除此之外,张明在访谈中表现出来的对弘一法师的关注也让读者认识到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有利于激发同处于泉州这个环境中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励着泉州籍作家汲取泉州丰富的历史营养进行创作。

(2) 关注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由林华东教授主编、陈燕玲教授编著的《闽南文化概要》一书中提道:“宋元以后,闽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心转移,另一个是向海外扩展。”<sup>⑩</sup>自唐代,就有不少闽南商人、水手流落海外,为了生存,他们“下南洋”,成为所谓的“蕃客”。一方面,以这些商人、水手为媒介,闽南文化传播到了东南亚等地,另一方面,他们带回的南洋诸岛的文化也丰富了闽南文化的发展。从东南亚的华文创作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不少闽南文化的影子。包括闽南方言的运用,闽南民间传说、闽南戏曲和泉州南音在华文文学中的出现。在与张明先生交谈中,谈及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张明告诉笔者,他曾经在社科联和泉州学研究所工作过,对闽南文化和泉州学都有所涉猎,并且组织过多次闽南文化的研讨会。《泉州作家访谈录》一书中,他也表现出对闽南文化海外传播的关注。如在《走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刘再复访谈录》中,他向生活在美国的刘再复先生询问当代海外的华文作家创作状态,在对话中我们发现,这些海外华文作家因为远离故乡文化的滋润,在生活素材的选择上远没有国内的作家来得“幸运”,他们也缺少权威的评论和研究。在《海外华文写作:中国文化根的认同——朵拉访谈录》中,面对世界华人文学圈的知名作家朵拉女士,作者向朵拉女士了解了当代马来西亚华文创作情况以及马华部分比较有影响的华文报纸和杂志,在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马华文学勃勃的生命力及马来西亚文坛活动中对年轻作家鼎力相助的社会热心人士。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庄伟杰访谈录》,张明从庄伟杰著作《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入手探讨当今海外新移民文学出现的微妙变化,让我们了解到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边缘性的另类文学,随着社会文化和各种因素的作用而不断发生变化。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在这些华文作家的写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特色的闽南书写和移民地的风俗相结合,体现了闽南文化移步南洋后,在华文作家“精心改造”下所焕发的旺盛生命力。

(3) 致力于泉州文学的发展。近年来,作为诗歌创作的重镇,泉州地面上出现了不少地方诗歌创作群体,如晋江诗群、惠安诗群。这些诗群成员较为固定,创作题材、形式丰富。这些诗歌群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泉州文学的发展状况。在《文学的事,都是我乐意做的——刘志峰访谈录》一文中,以晋江诗群为切入点,而后又从晋江诗群窥见“晋江文学现象”和晋江地方杂志、刊物。在《作家的重要责任是把美的东西呈现——吴瑞聘访谈录》中,作者张明联系其具体作品,就如何更好地把握乡土题材以促进小说创作进行探讨。据统计,在《泉州作家访谈录》中,张明多次就“泉州作家创作现状”进行发问,针对被访者的回答,询问其如何更好地促进泉州文学的发展,让其结合自身经历和所擅长的文体对青年作家提出创作建议,避免年轻作家走弯路。作为《泉州文学》的副主编,“对《泉州

文学》刊物的建议与希望”这个问题在针对 24 名泉州籍作家的访谈中出现了 22 次,这体现了作者张明希望泉州作家更多地关心家乡文学发展,关心家乡的地方刊物。从《泉州作家访谈录》中,可以看到张明对泉州文学的殷切关心,其力图为年轻作家创作提供新思路,希望更好地提高泉州地方刊物的质量。

## (二) 对话的互补性

《泉州作家访谈录》充分体现了对话的互补性。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访谈录作为是对话批评的一种,法国理论家托多洛夫曾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和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sup>⑩</sup>访谈录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模式,以其独有的语体特色改变了文学批评理论由单一评论者独自承担批评任务的批评模式,将文学批评变成了集体的共同产物,甚至是作家本身参与评论,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实现思想的碰撞交汇。访谈双方同时在场,最大程度上稀释了物理时空的限制,为作家和作者提供思想交锋的契机。作家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谈论成长经历、创作体会,谈论对文学、人生及作家重要作品的独特解读,如在《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刘再复访谈录》中,张明询问刘再复,莫言、高行健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之处。刘再复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分别从中国文化语言、西方文化语言、一般的批评语言描述了他们创作风格的异处。随后双方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将理论文章与散文相结合,更好地将国学与文学相结合。访谈对话的过程无疑是双方互补的过程,在“你问我答”中,被访者是预设的“答疑解惑的师者”。采访者耐心倾听,做好发问准备,对话比起其他的活动更能对作家产生直接刺激,对话双方更容易碰撞出思辨火花。在对话的过程中,作家在回顾自己人生阅历,发表自己对人生、艺术的看法的同时,有可能会产生顿悟,思考总结一些自己原先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涌现出新的创作灵感。这将启示作家在今后写文章的时候注意完善自己存在的不足及就访谈过程中的撞击出的新问题展开具体论述。互动的问答过程颇有教学相长的意味,访谈者在提问过程中可以就自己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随时发问,实现批评与接受双重互动,受访者容易通过对话获得耳目一新的新思路,你来我往的思维碰撞充分体现了对话的互补性。

## (三) 对话的逻辑性

在问题的设置上,该书表现出极强的逻辑性。访谈一般是以采访者的提问为主线来引导整个对话过程,故访谈问题的设置和衔接显得尤为重要。不难发现,张明的访谈框架整体围绕着泉州地域文学核心展开,其中涉及作家的文学心路、作品分析、乡土情怀。每个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他的阅读,部分作家在写作之初甚至会模仿作家经典作品的写法,故张明特别关注作家创作伊始的经历及让其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随即再由作家所擅长的文体及其代表作展开询问,细心捕捉作家的兴趣、爱好及其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如在《文学是作家生命的回光——万国智访谈录》一文中,张明从作家万国智的生活背景、经历和体验入手,层层递进,谈到对万国智先生影响巨大的诸多作家,并从部分作家的创作联系到万国智先生的代表作与散文观。在实际访谈过程中作者张明善于抛砖引玉,注意去抓住不同作家身上的闪光点与独特之处,根据不同作家的特点层层深入,求同存异,

描绘五彩斑驳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形象。如在《文学,在我幼时就种下了根——龚书绵访谈录》中,张明就其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发问,结合作家龚书绵的回答自然过渡到其家学渊源对其创作的影响,随后又谈及其散文代表作。张明的提问不忘围绕着泉州地域文学这个核心展开,关注由于历史原因,数十年才重返大陆的作家龚书绵在台湾的生活及浓浓的乡情在作品中的反映,并询问其对闽南文化的看法。笔者了解到张明在和泉州籍作家访谈前需要做充足的准备工作,知人而后论事,要在大量阅读作家的作品和评论家们对作家的评论的基础上设计访谈提纲。围绕泉州地域文学这个核心,在访谈过程中,框架明确,条理清晰,衔接自然,随着作家的思路“移步换景”,充分体现了对话的逻辑性。

#### (四) 轻松闲适的对话氛围

访谈录作为特殊的文体,重在求实直观地记录访谈过程,闲适的谈话氛围容易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笔者注意到,作者张明在访谈过程中注重把话语主动权交给作家,使其尽情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营造轻松闲适的对话氛围。作家可以就作者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访谈过程当中畅所欲言,及时表达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在访谈过程中,作家回答中提到的任何一个小细节如地点、人名或经历等都可能成为作者提问的下一个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双方抱着无功利的心展开对话,如同唠家常一样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释放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抛弃原有的批评模式的严肃和刻板,力图通过贴近日常的言语来完成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审美、评价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张明文风朴实,其提问的方式巧妙委婉,或根据时事来询问作家的看法,或联系具体作品展开作家对创作美学的思考,或根据评论家对作家的评价展开询问,提问不拘形式,不占较大篇幅,把话语主动权最大限度地交给作家,营造轻松的氛围,在对话中不时体现作家的精神气质与状态,为读者提供接近作家的一种观察可能。如在《为孩子们,我应该拿起笔——庄之明访谈录》一文中,作者就其作品《新星女队一号》发表后引起的轰动发问,继而与庄之明先生共同探讨优秀文学作品应当具备的要素。张明的提问不占大篇幅,而是把话语权最大限度地交给作家,默认受访者为主角,对话中彰显文人学者的智慧。在《对文学要虔诚,作品才会动人——蔡芳本访谈录》一文中,作者用幽默的笔调从作家蔡芳本的笔名“老山羊”入手,让读者看到了作家蔡芳本的个性与本色。又用趣味性的语言笑称其三部主要作品《做一只快乐的猪》《只要你愿意》《过简单生活》的书名串起来就成为一句特别的口号:“只要你愿意,过简单生活,做一只快乐的猪。”<sup>⑩</sup> 作者的语言极具趣味性与睿智性。

在《泉州作家访谈录》中,张明试图在与众多声音的对话中体现泉州文学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作品中体现浓浓的闽味乡情;二、关注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三、致力于泉州文学的发展。张明用其朴素的语言充分体现泉州地域文学特点,体现泉州作家的原乡情结和作者对泉州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访谈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集语言的严谨性与口语化于一身,作者张明在访谈中注意营造轻松闲适的谈话氛围。《泉州作家访谈录》中作为批评与接受的采访者和易受启发的被访者在访谈中碰撞出的思辨火花,充分体现对话的互补性。围绕泉州地域文学,张明在提前了解作者及作品的基础上,有逻辑地发问,体现了对话的艺术。笔者认为,访谈录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用一种更为贴

近日常语言的对话来实现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审美、评价工作,让读者对作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作家通过对话进行自我回顾,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思维方式做出总结,对话中产生的思想碰撞或许对作家今后创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泉州作家访谈录》丰富了泉州文学史的研究,为后人研究这些泉州籍作家提供了宝贵的文字材料。与此同时,在访谈过程中,作家们针对泉州文学创作所提供的建议也对推动泉州文学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该访谈录能给予读者文学性启迪,特别在《海外华文写作:中国文化根的认同——朵拉访谈录》一文中,张明与海外华文作家朵拉就如何以小说创作来探索女性命运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作家朵拉列举诸多女性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例子,如在农村地区的不少女性被迫沦为生殖工具,甚至忍受着被丈夫家暴的苦楚,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那些帮助受害女性吐露心声,与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思想进行抗争的女权主义作品的难能可贵。访谈录带给笔者以情感上的冲击,让笔者深刻体会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必要性。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该访谈录并没有实现对话双方的完全平等,而主要以被访者为主,访者为辅,大多是赞同被访者的观点,或者是顾虑被访者的权威而未直面质疑,以致让自己在谈话过程中显得有些被动。

#### 注释:

①⑨⑩⑪⑫⑬⑭张明:《泉州作家访谈录》,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序、第2、5、16、117-118、50、53、237页。

② 冯健:《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③ 陈玉:《访谈录批评文体研究》,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801&filename=1017114019.nh&v=MjQ4MTRxVHJXTTFGckNVUkxPZlIlUnZGQ2ptVjdyTlZGMjZHYks1R3RlTnBwRWJQSvI4ZVgxTHV4WVM3RGgxVDM=(2017年5月1日)。

④[法]斯达尔夫人著:《论文学》,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7页。

⑤⑥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6-67、69页。

⑦⑭林华东、陈燕玲:《闽南文化概要》,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7页。

⑧林华东:《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7日。

⑮[法]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5页。

**相关链接:**张明,男,江西鄱阳人,现任泉州文学院院长、《泉州文学》副主编,副研究员。至今出版个人专著《自以为不是》《泉州作家访谈录》《泉州文化杂谈》,主编《泉州学研究新进展》,参与策划、主编《晋江流域小说作品选》《学术泉州》《泉南文萃》《情满泉州湾——〈泉州文学〉200期选粹》《丝路花开——泉州文学奖获奖作品选》等著作。

(林晓嵘,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类专业2019届毕业生;郑丽霞,女,1987年生,福建莆田人,文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泉州本土作家)